

●华夏传统文明与人生

●主编 / 乔力

为官之道

●王国宇 黄先禄 著



《华夏传统文明与人生》丛书

修身之道
立业之道
处世之道
为学之道
为师之道
治家之道
交友之道
为官之道
商贾之道
休暇之道

ISBN 7-5633-2323-6



9 787563 323234 >

ISBN 7-5633-2323-6/I - 135

定价：7.80元

●华夏传统文明与人生

●主编 / 乔力 副主编 / 彭立荣

蔡德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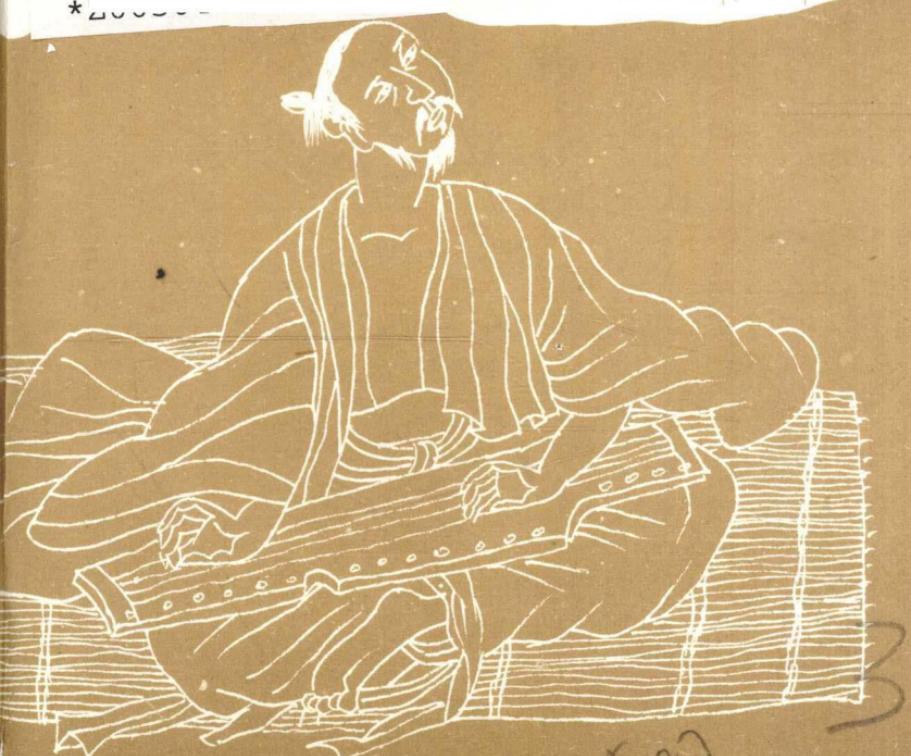
为官之道

王国宇

黄先禄

/ 著

8



华夏传统文明与人生

乔 力 主编

为官之道

王国宇 黄先禄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1 字数:149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633—2323—6/I · 195

定价:7.80 元

总序

人生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首先通过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进而考察其间容纳的内在实质，便会发现它作为与整个社会相共关连交织、互有影响制约的多向组合体，形成了不断的流动循环过程。有关价值准则、终极取向、认知体系与行为模式，在判断取舍中俱载着“先天”的承继、沿袭性，决非是超然于历史和民族传统之外的独立；就深层意义而言，其重大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中国历史文化悠远，包容丰厚浩繁，它优秀的文明传统经过上下几千年的选择、更变、补充、完善，已经渐次发展成相对周密完整的系统，并因为其深沉的理性启示与明晰的实践性，依然活跃在现代人的生活空间里，显露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基于上述方面的考虑，《华夏传统文明与人生》丛书从总体观照下的系统工程视角出发，分别就个体道德和行为实践、人际间双向或多向、家庭伦理及群体责任关系，所处特定社会位置上的一般规范准则，对生命意义、生活质量的充实提



升等各不同人生断面，参证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并通过现代观念重新进行审视，予以科学、客观的论析，使其精华发扬光大，在急遽变革发展的新时代仍继续产生积极主动作用。为读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年朋友们提供借鉴，让他们的人生之舟永远朝向真、善、美的境界行驶。

在写作中，丛书注意到哲理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统一，严肃思考和浅近事理的有机结合；或者由各个不同侧面分作横向探讨，或者着重沿史的脉络纵向把握，依具体内容而异，但清新畅达却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希望本书像一片绿阴，留在读者的心田，以供品味与回想。

乔 力



前 言

政坛，是人间世界中至为重要的一座帅台。我们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分析它，发现它是那样富有魅力，那样玄奥神奇！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古圣先贤，志士仁人，为之探索，为之求证；又有多少寒门庶姓，郡守县令，为之折腰，为之拼搏。当政者的言行笑骂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诚然，由于为官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因而他们在政坛上的表现亦千差万别，为官者本人的是非功过也往往由于苍海桑田而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他们的修养要求和言行规范，他们的管理目标和人生态度，他们的从政方略和经验，他们对过去成败得失的借鉴，对从政后备力量的培养和选用等等，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我们去发掘、鉴别和研究。

当然，就历史的全过程而言，在政坛上亦出现过暴君、奸臣、贪官、酷吏，这些蠹民之贼、佞幸小人，或罔上欺下，嫉贤害忠；或阳奉阴违，挑拨离间，致使英雄路短，生民涂炭，他们虽逞凶于



一时，但最终都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本《为官之道》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熊志庭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全书由王国宇拟订编写提纲，第四、十、十一、十二、十五章由黄先禄执笔，由王国宇在黄先禄初稿的基础上改定，其余15章均由王国宇执笔，最后由王国宇审定全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国宇

1996年3月于湖南省社科院



目 录

一、	清正廉洁	1
二、	克己奉公	9
三、	公而忘私	17
四、	淡泊名利	25
五、	忧国忧民	33
六、	国事为重	43
七、	济世爱民	53
八、	笃功务实	63
九、	为政有方	77
十、	直道而行	87
十一、	忠贞直言	97
十二、	执法如山	107
十三、	选贤任能	115
十四、	广开言路	129
十五、	妇女问政	139
十六、	贪财亡身	153
十七、	专权害政	165
十八、	结党乱国	177
十九、	昏愎丧邦	187
二十、	淫虐亡国	197



一、清
正
廉
洁



一室不染骨刻骨，始

射仙人风露身。

——张来《腊初小雪后梅开》



宋代吕祖谦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样来概括为官之道，无疑是颇有道理的，而在这三件事中，又把“清廉”放在首位，可见清正廉洁是为官者必须首先身体力行的。

因为只有清正廉洁，为官才有威信，人民才会信服，这样才能把国事治理好。所谓“公生明，廉生威”（李惺《西沤外集·冰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乞不用赃吏》）。领导者的威信是从廉洁的作风中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个贪官，都是人民所不齿的。

1.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

东汉时的杨震，在出任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经昌邑（治所今山东巨野东南）。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才做了县令。这天夜里，王密谒见杨





震时，从怀里取金 10 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我非常了解你，所以举荐了你，但你这个老朋友却为何如此不了解我呢？”王密连忙说：“夜晚没有人知道呀！”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见杨震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退了出去。（《后汉书·杨震传》卷五十四）

由杨震的却金话“四知”，使人不禁想到春秋时子罕却玉的故事。其时，宋人得了一块美玉，奉献给大官子罕，子罕不肯收受。献玉人说：“这块美玉我已经拿给玉工们看了，他们都说这是一块十分珍贵的宝石，所以才敢献给你。”子罕回答说：“我是一个官员，要以清廉不贪财为宝。你以美玉为宝，但若是你将它送给了我，你我都失去了宝，还不如大家都保留自己的宝。”（《太平御览·人事部》）

以上所举，乍看起来皆为私人生活琐事，但身为一



个有职有权的人，要做到这些却不容易。

2. 清端的于成龙

居官能拒贿以保清廉确属不易，但身居要职能保一生清贫更为难得，更为感人。清初的于成龙，就是这样一位“苦行僧”式的大清官。据《清史稿·于成龙传》载：

于成龙在清初顺治十八年（1616年）去广西罗城赴任县令时，因他是初登仕途，不少亲朋好友来祝他从此升官发财，而他在致友人的书中却说：“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他在罗城任职数年间，性甘淡泊，洁己爱民，任事练达，悉除诸禁。罗城百姓怜其清苦，曾募金钱送给他，说：“知道您清苦，我们敛这些钱给您买少许盐米。”于成龙含笑拒绝，说：“我单身一人，哪里需要这些钱，你们把它带回去，买些衣食之物，奉养自己的父母双亲，就当作我接受了这些钱吧！”力劝众人持钱归家。又一日，众百姓听说他家乡有人前来，又持钱而来，说：“你家中有人来了，把这些钱捎回家去安家吧。”于成龙笑着说：“这里距离我家六千余里，单身一人携带这么多钱会给他添累赘的。”严拒不受，百姓只好怏怏持钱归去。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升迁为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追送百里，哭而返。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于成龙由江防道擢任福建按察使，乘船由湖广黄州前往任所。照旧例，其用度皆由沿途州县供应，于成龙为免扰地方，在官船即将起行时，匆匆派随从家人登岸，购买了数石萝卜，送至船上。送行的人们不解地问：“这种不值钱的东西，买这么多做什么？”于成龙正言以告：“我沿途的饭食，全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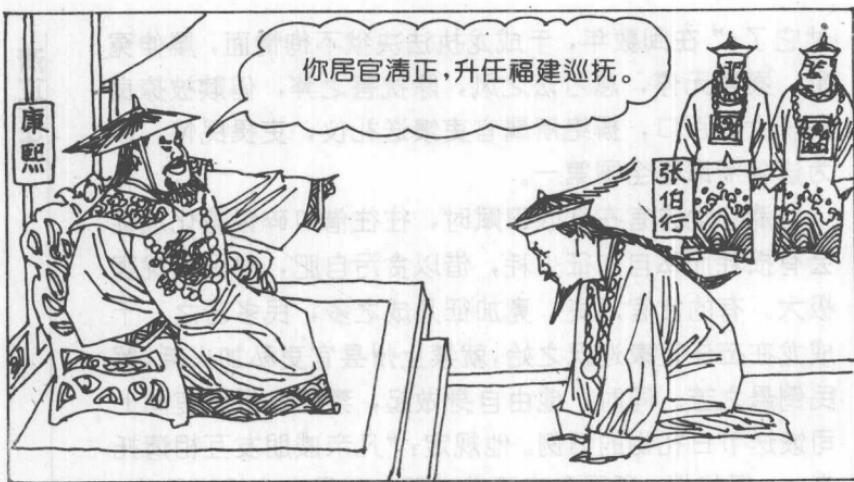
仗它了。”在闽数年，于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狱，案牍无停，息刁讼之风，除扰害之弊，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口，摒绝所属官吏馈送礼仪，吏畏民怀，以为该省清廉居全国第一。

清初地方官在征收田赋时，往往借口碎银熔化成锭会有损耗而私自加征火耗，借以贪污自肥，对民间扰害极大。有的贪官污吏，竟加征几成之多，民多苦之。于成龙在莅任直隶巡抚之始，就禁止州县官吏私加火耗，解民倒悬之苦。同时，他由自身做起，禁阻各级官吏向上司馈送节日礼物的旧例。他规定：“凡亲戚朋友互相请托者，一概峻拒；所属官吏及亲戚朋友如果有人馈送礼物，一介不取，以为各级官吏之表率。”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于成龙受命以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安徽两巡抚，身为清廷统领一方的封疆大吏，仍俭于自奉，平日仅以青菜及缚成把的咸菜粑下饭，江南人都称呼他为“于青菜”，诸子禁制华美衣装，皆穿布衣，御寒则穿木棉袍，恶衣粗食，安之若素，不为妻子、家族谋划资财，惟以兴利除害，察吏安民为己任。有一年，江南闹饥荒，他就在米中搀杂糠屑煮粥，全家同食，即使来了客人，也用之敬客。他说：“按照这个样子去做，可以积留下一些粮食，用来赈济饥饿的百姓啊！”江南百姓交口称颂。

是年四月，于成龙病故，属下官员进入其住室，为其料理后事，只见其衾帏既简陋又破旧，床头匣中仅存白金三两、旧衣服数件、青钱二千，粮米柜中仅有粟米五六斗。众官员见此情景，感慨万千，相率叹息而出。是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到江南延访吏治，人们纷纷传颂于成龙的政绩，交口称颂其居官清正，康熙帝信之弥笃，赐





谥曰：清端。

3. 圣明的康熙

为官清廉，关键要靠从政者本人具有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同时，在君主专制的社会，君主本人的圣明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清一代，长达二百年，以康熙时代的清官最多，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康熙帝本人的圣明，无疑是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康熙帝本人勤于政事，为政有方，对清官加以重用、厉行保护、深信笃。1707年3月，他南巡时，访知山东济宁道的张伯行清廉爱民，遂谕随从大臣说：“朕访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于是擢任他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确是一代清官，他一莅闽，见衙署陈设豪华、金银器皿，锦绣帷幕，鲜明耀目，便召吏员询问，得知





皆当地行户按惯例备办的，他就命尽行撤去，让行户具状如数领回。他向吏员们说：“吾生平未尝用此，岂可过分；况行户即百姓，可滥乎？”张伯行在闽为官虽仅二年余，但大张纲纪，明察利弊，褒廉纠墨，官清政惠，群情大快，教化大行。当他奉调赴江苏时，“士民攀留不及，皆呼号如失怙恃。”当他以巡抚身份莅境江苏时，鉴于官吏竞相虎噬狼贪，亲拟《止馈送檄》，传谕属吏。他在檄文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分。谁云交际之常，应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而后，又向吏员表明自己的态度：“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在他的大力整饬下，江南官场馈送之风为之一变。甚至苏郡民间“鲜衣美食，画舫笙歌，所费不赀”的华靡奢侈习俗，亦在张伯行严令之下为之一改。张伯行宦海生涯 30

